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

研究集刊

2

1982

责任编辑：杜玉亭

王树五

封面书题：刘克光

封面设计：李伟卿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目录

1982年第2期（总第17期）

- 一、“一二·一”运动是怎样获得全胜的……刘克光（1）
- 二、“一二·一”运动中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
——评“一二·一”运动从罢课到复课
的转变……蒋中礼（32）
- 三、蔡锷评述（续前）……谢本书（55）
- 四、周西成图滇与李龙倒周……荆德新（146）
- 五、赵藩的政治转变和文化成就……夏光辅（170）
- 六、云南回族的历史和现状（中）……吴乾就（187）
- 七、南诏大理史论（一）……木 芹（319）
- 八、家务建设运动与直过地区民族现代化
——陇川县邦瓦寨景颇族家务建设的
历史考察……李景煜（412）
- 九、克木人的氏族制遗迹初探……颜思久（437）
- 十、略论宋元明时期傣族之北迁……桑辉华（448）
- 十一、试论西双版纳茫乃政权
——傣族文化史研究之二……（471）

- 十二、试论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的关系……郭大烈 (499)
- 十三、洱源县凤羽公社白族民俗节日琐记
……赵振奎 (512)
- 十四、探索沉积在《藏彝走廊》上的历史遗存(上)
……刘达成 (538)
- 十五、彝族史诗《查姆》中的哲学思想……李国文 (572)
- 十六、血缘家庭史迹新探
——基诺族血缘家庭史研究……杜玉亭 (587)

“一二·一”运动是怎样获得全胜的

刘克光

编者按：本文系《一二·一运动史》未定稿的一个专章，由刘克光执笔。文中讲了（一）我们的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党的群众路线；（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四）广大教师的转变；（五）文化活动对民主运动的促进等问题。文中除注明出处的材料外，还引用了《一二·一运动史》稿的一些材料。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十月，蒋介石违背国共两党商定的《双十协定》，妄图发动全国内战。我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报告会，遭到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激起各校师生义愤，于次日起联合罢课。十二月一日，昆明国民党当局竟出动大批军警特务，进攻学校，殴打屠杀罢课师生，死四人，伤二十余人。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事件发生后，昆明学生继续罢课一月之久，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声援，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在各地党的领导下迅速开展，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一二·一”运动是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下，南方局正确指导下，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各大学的党组织和党的外围

组织直接掌握领导了整个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

党处在长期艰苦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面对着拥有各种专政工具的强大敌人，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不论是革命的高潮时期或革命的低潮时期，不论是合法斗争还是非法斗争，或党内思想路线的左倾或右倾，党总是充分估量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来争取革命的胜利。党代表人民的最高利益，领导人民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二·一”运动时期，虽然留在学校的党员并不多，但是他们是组织领导的核心，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抗日战争结束后“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方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和充分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发展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了革命队伍，将敌人孤立到最小限度。“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不了赤手空拳的学生，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毛泽东选集：《蒋介石政府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直排本第1224页）。

党怎样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呢？

一、我们的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我们党代表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党所提出的斗争口号，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能把他们的命运和希望寄托

给党，愿为党提出的斗争任务去奋勇献身，这样党就得了人心。蒋介石是大独裁者，他脑子里没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他们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只会把人民当作随意驱使奴役的牛马。李宗黄（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关麟征（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邱清泉（第五军军长），他们只会效忠他们那个集团。他们那个集团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的集团。而学生青年所要坚持斗争的，“反对内战、争取民主”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付出惨痛代价之后，热切希望停止内争，改革政治，医治战争创伤，重整破碎家园，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是人民最大的利益。

云南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随着国民党中央统治的强化，它与地方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深，抗战后期，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进入云南，美国驻军上万，加上内迁的各方人员，近百万人的军糈民食，都要云南的农民负担。贪得无厌的压榨，使得云南人民喘不过气来，濒临民不聊生的境地。龙云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抗战开始后逐步靠拢我党，不容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省政府被蒋介石武装改组后，龙云被挟持去重庆，沾满云南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李宗黄再次回到云南，以强化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遂使人心丧尽，民怨沸腾。“一二·一”运动像火山的喷火口，其来势之猛烈，自有它的必然趋势。

自一九三八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后，带来了“五·四”、“一二·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形势新的斗争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扬，党为了应付国民党反动派在这段时间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

巧妙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执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①任务，聚集自己的力量，传播革命的火种，团结了广大群众，把一切进步势力组织在自己的周围，不失时机地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南联大成为昆明的“民主堡垒”。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成员为骨干，发动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一再给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以有力的打击。民主运动每前进一步，都显示了人民的胜利和反动当局的失败。

“一二·一”运动的四个月当中，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时事晚会到十一月三十日，全昆明市总罢课，是运动的第一阶段，是运动的序幕阶段。

2. 从十二月一日惨案发生到十二月十八日决定停灵复课，是运动的第二阶段，是民主浪潮席卷全国的阶段。是运动的高潮。

3. 从十二月十八日酝酿复课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复课，是运动深入发展的阶段。

4.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复课到三月十七日四烈士殡葬，是运动的最后阶段，是巩固胜利，扩大成果，总结经验，将运动热情引向长期不懈的日常斗争的阶段。

这四个阶段都有各个阶段的斗争中心，每一阶段都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时事晚会、灵堂公祭、复课斗争、烈士出殡是四个高潮，一浪推着一浪向前发展，形成声势浩大而又有细致深入的思想发动的群众运动。

党在“一二·一”运动过程中，斗争策略的运用是十分灵活机动的。既要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使蒋介石的威胁、恐吓、高压、分化等破坏阴谋不能得逞，又要充分估计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在坚持原则时又时时考虑照顾中间群众的情绪，有时为争取多数，甚至要作出必要的让步。如第一阶段，修改罢课委员会的“罢课宣言”，把“反对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改为“反对外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看起来是一个字的改动，却揭露了三青团蒙蔽所谓群众的阴谋诡计，争取了绝大多数学生赞成罢委会的主张，而取得认识与行动上的一致。又如在复课条件的争论上，停止内战，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本来是长期斗争的目标，与目前必须达到的条件——如取消非法禁令，恤死抚伤，更正造谣报导等的要求不能等同看待。有的人主张内战不停止不复课，美军不撤不复课，这当然是不合时宜的要求，及时纠正这些过激情绪，使斗争切合实际，才能保持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在罢课一月，群众已有疲劳情绪时，应适可而止，及时提出停灵复课，转变斗争方式，如此等等，都是策略的灵活运用。

全市学生总罢课是一场复杂的斗争，从罢课开始到全面复课更是十分复杂的斗争，处理得好不好，关系到这次民主运动的成败。蒋介石亲自出马威逼学生无条件复课，派他的亲信作为调人策士接踵而来，如果学生不复课，就先让大学校长下台，全体教师辞职，三大学北迁，云大解散。学联及时对惩凶问题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关麟征、李宗黄在云南站不住脚滚蛋了，证明他们输了理，就要适可而止，改变斗争策略，做争取多数的工作和学校当局的工作，大学校长转向学生，变压力为助力，全体教师与校长共进退，多数转向学

生一边，使学生罢课赢得胜利。如果我们一味强调不杀掉李宗黄、关麟征就不复课不出殡，抓住“傅斯年以脑袋担保”，“教师以去就力争”就以为得计，那将会导致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流氓成性的蒋介石是会采取下策的，李宗黄、关麟征既是蒋介石集团利益的代表，元凶祸首自然是蒋介石，蒋介石不垮台，李宗黄、关麟征也是惩办不了的。

党在领导整个运动时，执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应该作充分的肯定。但是在这样激烈复杂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思想跟不上形势，学联的具体工作中，有时难免有考虑欠周，情绪上忽左忽右的倾向，表现为开始组织罢课时，曾经提出过：“开展伟大的罢课、罢工、罢职、罢市”等不策略口号^②；在《告昆明市父老书》中也有：“开铺的关起铺门来、做工的工作停下来，军警的干涉和流氓的殴打，用我们一致的反抗，教他们放下武器来！”等等口号，以致授人以口实。反动派曾借此大肆宣传，“共产党要煽动罢工、罢市、罢役、罢赋、罢公、暴动”，以此淆乱视听，曾一度引起中间群众思想上的不安。

如何从指导思想认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和马识途在香港谈话时讲到昆明“一二·一”运动，讲得很透辟。她说：“我们的斗争总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广大群众通过运动，不断提高觉悟，日益革命化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准备投入新的斗争。”“如果你们搞垮了，自己队伍散了，群众泄气了，敌人乘机高压，不要说不能扩大党的影响，扩大党的组织，连现有的组织和士气也保不住，谁还愿意来参加组织呢？所以要随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和适可而止这些原

则。”^③这是党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之谈。

二、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我们的党最善于考察群众情绪、群众思想、群众要求，把握群众的脉搏，在群众运动中，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因势利导，引导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那时，谁也不感觉党在发号施令。党的观点、立场为广大群众支持、拥护，愿意在党的号召下努力工作，接受党的领导非常自觉。

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每个关键时刻，每个重大问题，作出的正确决定，来自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党又通过党员到民青成员，再到积极分子以及一般群众，一步一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去贯彻执行这些决定。既不用登高一呼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也不是主观地设计好一些条条框框再交群众去做。在实际工作中有事要和群众商量，党又要善于发现正确的东西，抵制错误的东西，应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党的态度就必须明确坚定。

“一二·一”运动前后，昆明学生有几次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群众发动面广，思想工作深入，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给人一种忘不了的印象。如一九四五年的纪念五四周年，“一二·一”运动期间的灵堂公祭，三月十七日的烈士出殡，都是上几万人的群众活动场面，既体现了群众声势的轰轰烈烈，又有党的组织工作的扎扎实实，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也体现了领导的组织才能。“一二·一”运动进程中，

也出现过两度大的危局，因为党领导的正确得宜，避免了群众中间的对立和分裂。一次是三青团打出无党无派的旗号，阻挠罢课宣言的通过，企图瓦解罢课，起初来势很猛，迷惑了一些人，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宣言作了适当的修改后就争取了群众的大多数。另一次是停灵复课当中的斗争，当党组织还未明确表态要复课时，卢汉、霍揆彰（关麟征停职后代理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已奉命准备作最后之处置。学校当局劝学生复课，并一再施加压力，梅贻琦、熊庆来提出辞职，傅斯年要解散学校，罢课时间长了，中间分子逐渐消沉，积极分子却又不顾客观实际提出许多过左的口号，群众当中教师当中曾出现过对立情绪，是党组织及时提出适当修改复课条件，把斗争的僵局打开了，把大多数团结过来，虽然思想工作有些粗糙，但总算又团结了大多数人，避免了群众当中的对立，最后还是挽回了分裂的危局。

避免这两次大的分裂，是党特别注意了争取、团结广大中间群众的工作，中间群众的转向，往往关系到斗争的成败。我们能够发动规模宏大的群众斗争，握有专政工具的阶级敌人反而一筹莫展，毫无办法，我们得到广大中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就有了决定胜利的把握。为了团结争取中间群众，每次行动一定要照顾中间群众的觉悟程度，斗争的口号和方式要能够为他们所接受。

由此可见，群众路线也是党取得运动胜利的一个决定因素。

列宁说：共产党“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6—7页）

群众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确信共产党的正确，他们愿意跟着党走。昆明的广大群众，由于耳闻目睹，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都是深恶痛绝的。国民党反动派想用“奸党”、

“赤匪”吓唬人民，离间人民和共产党的关系，他们把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政府的人都称为“共匪”、“奸党”，无怪人民要拥护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根据人民的切身体会，所谓“奸党”、“赤匪”，都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一二·一”运动中，工人、农民、士兵、军官、职业青年、公务人员、人民团体、政府官员，甚至在国民党、三青团内的有识之士，也都逐步站到青年学生一边。例如参加烈士灵堂公祭和出殡的人那么多，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和四烈士联系着的，反内战、争民主是和大家的命运联系着的。道士、和尚、尼姑，以他们的虔诚来祭吊颂赞四烈士；多少护士医生来为伤者服务；罢委会宣传股，每天都有人来捐纸捐笔墨，捐广告颜料；四烈士出殡沿途燃放爆竹值旧法币五十万元（约折合人民币一千元），是昆明市爆竹业同业公会所捐赠。昆明市的警察保护学生的宣传集会，见特务逮捕学生要求引渡，甚至通知罢联认领，警察局正式拒绝关麟征要求他们逮捕学生。^④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运动的态度。

“一二·一”惨案发生时，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分子曾经里应外合，纠集起来妄图破坏学生运动。三青团的周绅曾率队到师范学院行凶杀人，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发动无党无派签名反对罢课，收集情报，开黑名单等等，这就不能不引起进步同学的注意。经过几次反击以后，三青团成了过街的老鼠，三青团的名声越来越臭不可闻。他们的内部也起了很大的分化。有的公开发表声明退出三青团，有的转而同情支

持学生运动，参加罢课当中的进步活动，这也体现了群众运动的威力。

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争民主、争独立、争和平、争自由的浪潮汹涌澎湃，深入到了各个阶层，各个政治团体，各个群众组织。昆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中心，直接影响全国广大地区，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群众运动的深远影响来说，那也不仅仅是看当时的昆明，还要看到全云南的广大城乡，看到国民党的统治区，党所领导的解放区，也都从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受到激励和鼓舞，直到现在，人们对四十年代昆明发生的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还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感受。

为什么当时群众运动会开展得这样好？

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同扎扎实实的日常群众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要以坚实的日常工作为基础，地下党要求每个党员，每个“民青”成员，必须做好群众工作，交朋友，团结群众。交朋友的办法，不是向群众作空洞的说教，讲大道理，而是切切实实地为群众办好事，党通过学生自治会，在群众中取得广泛的信任，先抓群众的生活福利，办好伙食，关心群众的生活。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要去做工作，根据群众的不同水平，不同爱好，不同的觉悟，组织他们参加各种适合自己口味的社团，用各种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

强调要做好级会、系会的工作，因为这是团结广大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合法的公开组织。功课较好的党员，民青成员就要在系会、级会中起作用。

社团，有读书会，研究会，壁报社，歌咏队，体育会，

剧艺社，新诗社，文艺社，美术社等等团体，甚至基督教徒的团契，各地的同乡会，同学会等的群众性组织，进步力量也要去开展工作。

“一二·一”运动中，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宣传力量，从事社会活动的力量，似乎都是现成的：要文章有文章，要画有画、要歌有歌、要戏有戏、真是得心应手，各种社团组织早把各方面的力量人才都储备好了，这是平时积累的好结果。就拿那个地下党秘密建成的印刷厂来说，它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那样大的作用，如果没有它，会使我们的工作带来多少困难，有了它，一张《罢委会通讯》就像一枚炸弹，运动期间发出的上百万份宣传品，那是多么大的威力。

二是党员和“民青”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党要求自己的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做到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从外表看党员与群众完全一样，但他们能艰苦的工作，异乎常人的工作，经常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影响群众，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带动群众，团结群众一起去战斗。要积极工作，又不能暴露，使群众感到有党的领导，又要使群众指不出究竟真正的党员是谁，所以党员的领导艺术就是要使自己的生活习惯，言谈举止，学习爱好等各个方面，都要和周围的大多数群众状况相适应，不能显出任何突出，这样才能隐蔽在群众之中，不致被敌人注意。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才能在同学中建立威信，和你一齐去进行斗争。怎样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当学生，在平时就要做到品学兼优，还要处处关心群众生活；在关键时候，就挺身而出，临危不惧。四烈士中有英勇牺牲未接上关系的党员潘琰，有几次被特务打

伤的许多“民青”成员；缪祥烈当时也是“民青”成员，在抗击暴徒中被炸伤，以后成了残废。他们的带头模范作用都是很好的。

三、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这是党的基本方针。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一二·一”运动的胜利成功，也包含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第一是争取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为昆明的民主运动创造了一个比较优越的政治环境；第二是民主同盟工作的展开，成为一支强大民主势力，争取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社会民主爱国人士、文化界人士在党的周围。

第一，在争取龙云及地方势力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南方局就曾指示云南党的领导机关，在云南搞好工作，要切实注意统战工作，要争取团结地方势力，特别要做好争取龙云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多次亲自出面做这一工作。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南方局派马子卿来云南担任省工委书记，临行时周恩来、董必武向他重申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宣传党的政策，做好争取团结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八月，省工委派人通过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刘震寰和龙云的部属张冲等的关系接近龙云。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

皖南事变，国民党统治区充满了白色恐怖。这时，党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谈话、通电，都曾通过内部关系告知龙云，使他明了真象。龙云曾表示对时局的耽忧，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当时，国民党已在成都等地抓人，他也曾说蒋介石这样做不得人心。这时特务头子康泽、戴笠、刘健群相继来昆，声称云南有异党活动，要求龙云采取行动，龙云敷衍应付。拖到这年五月，为了应付国民党中央，才成立党、政、军联合汇报会，龙云自己当主任，指派袁丕佑（旧省政府秘书长）为代表，与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裴存藩，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组成三人小组。龙云授意袁丕佑在三人小组中掌握情况，重大问题要向他汇报，有行动要经他批准。康泽曾提出要求逮捕人，特别要逮捕西南联大的进步分子时，龙云曾对他说，没有发现谁是共产党，只是些爱国青年，若中央有材料，希望交给我，康泽拿不出证据，也不敢超越龙云的权力，所以就无可奈何。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云南没有发生过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突出事件。

一九四一年五月，南方局派郑伯克接替马子卿主持省工作委员会，又先后派侯方岳、刘清来昆，一九四二年组成省工委的领导班子。认真执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基本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省工委研究了云南的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利用国民党中央同地方的矛盾，壮大我们的力量，争取团结龙云的地方实力派，以及护国元老，开明士绅，名流学者，进步教授和社会进步人士等，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的军队主